

贵州钱币

2017年第2期
(总第20期)

主 管: 中国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
主 办: 贵州省钱币学会
编辑出版: 《贵州钱币》
编辑部
主 编: 肖 杰
副 主 编: 闵培忠
责任编辑: 张传新 刘 华
黄雅迪
校 对: 刘 华 黄雅迪
地 址: 贵阳市富源中路
318号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2楼
邮 编: 550005
电 话: 0851-83921722
Email: liu3921722@qq.com
刊头题字: 黄锡全
2017年12月出版
印 刷: 贵阳云岩明进彩印厂

目录



贵州钱币

- 民国时期贵州省县(市)银行概况 刘力 解飞 2
铜仁地区钱票小史 森林木 听雪楼 9
道光宝黔小平行用钱版式综述 黄雅迪 20

钱币研究

- 东汉末“将主袁公”钱浅析 王子华 23
近代钞票上的银元初探(中) 叶真铭 26

钱币文化

- 清代龙凤纹大花钱寓意吉祥 宋康年 34



反假货币活动专栏

- 贵阳中支成功举办全省人民银行系统反假货币知识与技能竞赛 35
贵阳中支举办贵州省首家反假货币示范县创建启动仪式 37
反假货币宣传工作效率提升及方法选择 38
创新宣传方式, 推行“互联网+反假货币宣传”模式 42



抗日战争爆发后，财政部为配合“地方财政自治”，推行“新县制建设”，特拟订《县银行法》(适用于省属市)，以加强对全国金融业的管理。经行政院批准于民国29年(1940年)1月20日公布施行。同年12月6日，财政部公布《县银行章程准则》，供各地县、市银行据以制订章程。

初期，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对县、市银行划分84个督导区，并指定各地中央银行的县乡银行业务督导处负责管理。民国31(1942年)年起，改由各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负责检查、督导。34年4月18日起，依《财政部授权各省财政厅监理县银行业务办法》规定，各县、市银行改由各省财政厅监督管理。

贵州省政府接奉行政院等下达有关命令、办法后，随即转饬各县(市)政府遵照办理。由于民国28年(1939年)后，贵州已有不少县陆续建立了县合作金库，重要集镇和交通要道，也多设有国家银行；大部分县经济条件较差，筹建银行不易筹措资金，同时缺乏业务经营和管理工作的熟练人手，因此进展迟缓。至30年底，仅有大定(今大

民国时期贵州省县(市)银行概况

■ 刘力 解飞

方)、赤水、绥阳、习水、天柱、印江、铜仁、郎岱(今属六枝特区)、平坝、毕节、思南、遵义、台拱(今台江)等13个县呈请筹设；其余如贵阳、黔西等69个县、市，均请暂缓组建。32年10月后，省内县银行的筹建工作逐渐开展。当时，贵州省府为指导县、市银行的建立，特颁发《筹建县银行应行注意事项》通告执行。到38年2月止，先后正式开业的有习水、贵阳等19个县、市，筹建中的有纳雍、织金2县，以上共计21个县、市，共计26处，远远落后于全国县市银行发展的形势。

贵阳市银行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省内原设外地地方银行、商业银行先后撤离，且不允许新设商业银行，从而为设立贵阳市银行提供了有利条件。民国36年(1947年)3月7日，贵阳市银行筹备处成立，同年7月18日，择定正新街为行址，正式营业。

该行为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原订资本额为法币6000万元，后因货币贬值，改订资本额为法币2.59亿元元(约合当时银元2.4万元)。

该行主要任务为代理公库和存放款，为鼓励存款，该行举办过“纪念存款”，于举办“纪念存款”的同时，还发售“礼券储金”存单，但收效甚微。放款以短期拆借为主，放款利率随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但因期限短，金额过少，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小本经营者的需要。

民国38年(1949年)6月起，该行改以银元为记账单位，存、放款余额约合银元2万元左右，每月费用开支近2000银元。同年9月1日，因业务清淡，收益日减，开始裁汰员工，第一批遣散职员21人、警工7人。11月，该行经理离职，襄理张文骏、出纳主任余平等主动负责，维持该行秩序，保全档案、账册，并于解放后送请军管会金融接管处接收。

习水县银行 民国30年(1941年)7月，习水县政府决定建立习水县银行，函聘地方士绅9人组成筹委会。议定县银行设董事9人，监察3人。额定股本总额法币40万元，其中公股12万元，商股28万元。经过一年多的认缴，筹委会于32年春收到公股额12万元，商股额14万元，呈报中央财政部。是年8月1日，习水县银行核准注册，额定资本国币40万元，分为4000股，每股100元，并颁发营业执照，随即召开股东会议，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长叶沛

霖、经理黄保元)，议定职员名单，组成工作班子，于10月10日正式开业，为贵州最早设立的一家县银行。主要业务为吸收工商业者的存款；放款对象以入股之股东为主，利率8‰—10‰。该县与四川合江县毗邻，贸易往来较多，遂与合江县银行订立通汇合约，开展汇兑业务。此外，习水县银行还发行过银元辅币券，面额有1分、5分、1角3种，各为大洋100元。36年6月底，存款总额计法币1507万元，放款1420万元，累计盈利858万元，公积金22万元。37年后，通货恶性膨胀，百业萧条，该行无法抵御经济崩溃的狂澜，于解放前夕倒闭。

遵义县银行 该行筹备于民国31年(1942年)12月，收齐股本300万元，其中商股280万元，公股20万元。32年3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刘瑞冀、邹聿修、陈秉忠、柏建儒、王雨苍、喻界凡、余文青7人为商股董事，县府指定财政科长任占琴为公股董事，选举柏杰生、牟贡三为商股监察，县府指定王筑生为官股监察，聘请刘瑞冀任经理。4月15日，银行经县政府准予先行开业，经营存放款，以商业往来为主，但初期因规章制度不健全，发生挪用公款购销棉纱、布匹事件。33年10月，该行由财政部批准正式开业，有员工21人，最后一届负责人王健藩，主





要代理县金库及办理少量存放款、汇兑业务。解放后由遵义市军管会接管。

修文县银行 民国37年(1948年)4月成立，同年，修文县银行鉴于境内辅币奇缺，市场交易不便，遂发行面额为1分(2200张)、5分(3400张)和1角(1080张)的“修文县税捐稽征券”300元，代替辅币流通，不到一个月，县政府下令立即如数收回，共收回1分券912张、5分券2894张、1角券980张共251.82元，经政府决议，将结存未收兑之银元24.09元，给县文史委员会作县志印刷费用。

赤水县银行 筹备会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1日成立，共有32名筹备委员，筹备主任侯之坦，筹备会设在木业公会内，即今工商银行现址。该行实行股东制，计5000股，官股占1000股，共集资法币500万元，董事长侯之坦、行长向贤才。34年11月，银行正式开业。主要有存款、放款、汇兑、贴现、代理、代办、仓储、保管等10项业务。据该行民国35年(1946年)度报表反映：各种存款年初余额为法币1612万元，年末为3578万元，除去货币贬值因素，其业务发展尚为可观，后曾出本票参与市场流通。行长向贤才于37年5月辞职，继由崔子英担任。

湄潭县银行 民国35年(1946

年)，经省政府批复设立。行址在湄潭县城北街(现义泉镇政府地址)，董事长张宗杰、经理吴应榜、出纳员何德昌。经营储蓄存款、放款等业务。开业近3年，因货币贬值，无力经营而停业。

桐梓县银行 民国34年(1945年)8月建立，名为官商合办，实系私人集股经营，经国民政府财政部登记颁发执照。在松坎设办事处。并代行金库职能，办理县财政经费、税金存入。经营桐油、棉纱、盐巴、大米、山货等商业运销，桐油、山货从滇缅公路出口。解放后由县人民政府接收。

1949年夏天，国民党发行银元券后，辅币跟不上，市面交易困难。于是，桐梓县银行大量发行本票，作为银元券的辅币，在市面流通使用。面额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等。“至于发行了多少，外面人无从知道，就是行里一般人员，也是弄不清楚的。”当时的县长陈茂柏，正在疯狂地搞“应变”大计，大肆搜刮民财，故对县银行发行本票一事极感兴趣，大力支持。本票大半在发放公教人员工资时发出，并从缴纳税款中收回。

当时桐梓有两家石印铺子，一家是银行经理的弟弟开的，本票由一个姓罗的四川人设计、制版，印制。姓罗的又依样画葫芦，另制一版，在另一家石印铺印制并发行出

去。这样，市场上的本票，就越来越多了，县银行发觉后，从维护本票的信用出发，并不声张，私下把姓罗的请来，秘密协商，决定“下不为例”，不再印制了事。

那些流通在市场上的本票，一部份通过税款收回，还有一部份流散民间，危害甚重。

平越县(今福泉)银行 平越县银行在当时省内的县银行中，不但分支机构与职工人数最多，而且也是内部管理初具规模的一家县银行。该行于民国33年(1944年)3月开始筹备工作，次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原定资本额为法币200万元，实收120万元。该行先后成立凤山、牛场、马场坪办事处，全行共有职工29人。36年6月底，存款余额2.3723亿元(约合银元2.1万元)，放款余额1.9938亿元，纯益524万元，另有公积金157万元。计划增资法币5千万元，已实收资本2472.5万元，但未获批准。

该县为烤烟生产重点地区之一，该行为适应外埠客商收购烤烟的需要，经与贵州省银行、贵阳市银行等协商订立通汇合约，与贵定、贵阳两地厂开通汇兑。放款对象以烟商为大宗，着重办理抵押贷款，曾与城厢供销合作社签订50万元的往来存款透支合约。

民国35年后，法币贬值日甚一日，物价不断上涨。该行一度开办

法币折合稻谷的“折实定期存款”，约定按存入时市价折合稻谷斤数，于存款到期时按当时市价折付法币，颇具特色。但因通货恶性膨胀，市场物价一日数变，风险过大，存户有顾虑，收效甚微，不久即停办。

民国37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前夕，该行一度发行以银元为单位的“临时兑换券”，面额有1角、5角，1元3种，限在县城使用，持券随时可向该行兑取银元或按市场银元折付法币，发行量不多，不久即全部收回。同年，在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时期，又曾拨资兼营食盐运销业务。38年7月，国民政府发行银元券，规定原为法币辅币的镍辅币改作银元券辅币在市场流通，亦可向贵阳、重庆等地中央银行兑换银元，该行趁机下乡抑低收兑价格，向农户收兑镍币后转运重庆调换银元，从中牟取暴利。

平越县解放前夕，县长田兴穗将该行库存银元及仓存食盐强行提走。解放后接管，该行财产仅折合人民币旧币67.7万元。

独山县银行 民国35年(1946年)12月1日开业，资本为法币1000万元，商股占75%。董事长张松舫。历任经理为张春皋、都堪。有员工20人。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收。

贵定县银行 民国34年(1945年)开始筹建，37年7月开业。行址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工行大十字储蓄所处。经理周达开、副经理刘用和。

长顺县银行 民国37年(1948年)1月6日筹备就绪，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选出商股董、监事，并经财政部登记给照，随即开业。

大定县银行 民国36年(1947年)11月，按《县银行法》规定，由县政府与商民合资组建，报经财政部核准登记后，于12月正式开业。资本定额为法币6000万元，实有3000万元，其中公股为600万元，商股为2400万元。董事会由孙蕴奇等11人组成，全行职工12人。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代理收解公私款项及政府规定的其它业务。后因经营不力，于38年7月停业。

黎平县银行 黎平县与湘桂两省接壤，向为土特产集散地，商业较为繁盛，但因交通不便，县银行迟至38年(1949年)1月才成立。经理廖耀南(解放后任省政府参事、省民族委员会委员)，资本额定为银元1万元，系以广东银毫10万枚折算，其中官股占60%，由地方政府以修筑黎平公路建设工程结余经费拨充。该行以银元为记账单位，放款亦以银元为本位。曾发行“临时辅币流通券”1000元，面额有1分、2分、5分、10分4种，解放前全部收回。

安顺县银行 民国35年(1946年)10月4日安顺县银行在县商会礼堂

举行成立大会及第一次董事会，董叔明当选为董事长，杨国昌等15人当选为董事，韩文渊等5人当选为监事，决定于11月1日正式开业。官商合办，额定资本法币1亿元，其中公股1—40%，私股1—60%，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接收。

兴义县银行 民国34年(1945)6月，由地方士绅窦觉苍、赵仲辅(商会会长)、蒋征琪(曾在兰州中央银行分行任职，聚康银行总行协理)等发起，开始筹备，次年2月7日择定黄草坝镇上为筹备处试营业。资本额定为法币1200万元(约合银元6000元)，其中商股94户共700万元，官股实交500万元，3月20日正式开业。37年1月增资为2亿元(约合银元2170余元)，官股占40%。代理县金库收支款项，公库存款经常保持在200余万元。办理一般银行业务，一度以公库存款为基金，举办小额无息放款，每笔以5万元为限，定期1个月，可整贷零还，以小商贩、手工业作坊为对象。截至36年，上期存款余额1.7552亿元，放款余额1.0130亿元，获纯益1.3016亿元(约合银元1170余元)，累计盈余1.4009亿元，公积金199万元。

民国38年(1949年)，兴义县银行鉴于市场使用银元，缺乏辅币作零星找补，用土制白棉夹纸印制“银元辅币券”，面额为5分、1角、5角3种，在县内投放，以解决市场

需要。但因城乡人民对纸币已失去信任，不到1个月便收回，并停止发行。

晴隆县银行 民国35年(1946年)2月1日，撤销县农民银行合作金库，筹设县银行，由县官商合股集资600万元。36年(1947)，县人王少侯受贵州聚康银行副总经理刘熙乙之托，组建贵州农民银行晴隆办事处，王少侯为办事处负责人。然而因种种原因，银行一直未能成立。

铜仁县银行 民国33年(1944年)8月3日，铜仁县银行正式开业。

早在民国29年1月20日，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就公布了《县银行法》，要求各县成立县银行。贵州省政府接到行政院的命令后，随即转饬各县(市)政府遵照执行。到1941年底，第六行政督察区(今铜仁地区)的9个县中，有铜仁、思南、印江3个县准备筹建县银行，然而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立。

1943年7月，冯步洲任铜仁县县长后，积极筹建县银行。1944年，成立县银行筹备处，8月3日，县银行正式开业。

铜仁县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共有资本125万元，其中公股85万元、商股40万元。有员工11人，其中经理1人(由徐世清担任)，其余为会计、出纳、业务、勤杂等。行址设在现在的市政府右侧。

根据《县银行法》的规定，该

行主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代办县金库等业务。由于商业不发达，存款业务较少，主要是一些商号和少数机关单位存款，放款业务则较多。放款形式主要有抵押放款和保证信用放款两种。县银行对资金的安全极为重视，除抵押放款外，对保证信用放款也极为慎密，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放款风险。借款人要认真填写《借款借据》，承还保证人签注意见后，银行还要进行认真调查了解，核实借款人确实具有良好的信用和还款能力后才能放款。借款人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归还本息的，可以向银行申请延期还款，称为“展期”。例如民国33年(1944年)11月28日，铜仁专署主管科科长潘宜瑛前往独山县“抢运铜钱”，一时筹不足差旅费，向铜仁县银行信用借款10万元，由驻铜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谢贯一出具担保，月息6‰，由专署按月支付。这笔借款原“展期”1月，后又继续“展期”。但到了民国34年10月30日县银行关闭之时，银行毫不含糊地将这笔借款连本带息一并收回。

铜仁县银行由于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等原因，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30日关闭。

松桃县银行 民国34年(1945年)6月，松桃县政府根据县商会委员会要求和省令部署，筹办松桃县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7月，成立县银行筹备委员会，以县商会为主，发动集聚社会闲散资金，开办地方金融事业，调节商业经营。经各方协商后，于9月28日召开创立会。依据《县银行法》和地方经济实况。决定县银行实行官、商合办，资本额定为法币1000万元，其中官股250万元，商股750万元，以此立具章程上报。

民国35年(1946年)1月15日，松桃县银行试行开业。36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以(2936)号令批准成立，随令颁发银字第(2542)号营业执照。11月1日，松桃县银行宣布正式开业，并举行了开幕式，邀请商业各界，扩大庆祝活动。

按照银行章程，从股东中民主推选9人组成董事会，以下设经理、会计、出纳、营业、保管各1人，行员2人，组成经营机构，经理日常业务，重大问题由董事会研究决定。另设监察员5人组成监察机构，实行业务监督。每天营业前后，均由监察人员参加启库、封库。此外，还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听取经营情况报告。

松桃县银行开业两年后，因通货膨胀、物价飞腾、法币贬值，市场普遍以物易物，导致银行破产，被迫于民国37年(1948年)2月倒闭，清资退股。

据松桃县银行民国36年(1947年)6月30日业务报告表：

资本总额	10000000元
本期结益	2254249元
存款总额	1450000元
累计盈余	2254249元
放款总额	1325600元
公积总额	1500000元
上半年结益	2248303元



贵阳市银行支票



赤水县银行支票

黎平县银行发行的周转券半毫
样张(正背面)

作者：

刘力(关岭县档案局局长)

解飞(关岭民族高级中学教师
贵州省钱币学会理事)

铜仁地区钱票小史

■ 森林木 听雪楼

钱票也叫钱庄票、钱票、私票、制钱票、铜圆票、银票、流通券、私帖、商钞、商帖、代价券、土票、土钞、吊票等，云贵地区叫街票，是指未经政府法律允许，由县政府、县级机构以及县以下地方政府机构、县商会、钱庄、票号、银钱业、当铺、厂矿、企业、商店、油店、米店、寺庙甚至妓院和个人发行的，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能体现货币

的流通及价值尺度等职能的纸币。

历史上的贵州，由于交通闭塞、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是，钱票的印制发行却不算晚，据《贵州古代史》记载，乾隆二年(1737年)，“安顺府各级官吏额外浮收，重加火耗，多索钱票”。

清朝中叶，贵州钱票开始在黔东的铜仁、镇远、松桃等县盛行起来，多为商家发行，一无准备，二无担保，发行商店常借口倒闭，为害乡里。由是政府下令，以后出钱票的商家，由商会负责，须有10家

富商担保，至少须8家担保后方能发行，但并没有关于准备金的要求。

光绪十年(1884年)至民国13年(1924年)，是贵州钱票大盛的时期，贵州约有150余家各种商号发行钱票，仅铜仁一县就发行有钱票10多万吊。值得注意的是，贵州钱票的发行大多集中于铜仁地区，这和湖南钱票大为流行不无关系。

铜仁县

铜仁山城，因扼黔东门户，兼有锦江水运之便，自清代光绪以来，渐成为我省大多数县土特产和省外常德、汉口等地工业品的集散中心和销售市场，运销两旺，市场繁荣，马驮船运，络绎不绝。在这种形势下，银根吃紧，硬币稀少，满足不了市场流通，铜仁地区钱票便应运而生。其自兴至灭，概经3个时期：

一、兴起和发展时期 清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889—1898年)。这段时间，在铜仁市场流通的货币，有银两和制钱两大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时银两稀少，满足不了市场需要，制钱份量过重，行商往返携带累赘，加之制钱又必须搭配使用，交易不便。清光绪十五、六年间，一般大商号如张恒记、仁兴恒发记（当铺）、刘义泰、吴文茂、正兴东、福昌恒、王义发等10余家，便先后各自印制票币共约1万余吊，作为辅币使用。此种票币用印江四夹纸，以木板刻字印刷而成，长约5寸5分，宽3寸（市尺）。票面印有各家商号名称，和“凭票兑制钱一千文整”等字样，并加盖商号印信。各家票币都能在市场上流通，这是铜仁地方票币的起源。

初期，铜仁地方票币大都是殷实商号发行，因数量不大，都能兑现，颇有信誉，所以有的群众还把票币当作资金储存。尤其是大小行商感到铜钱携带不便，自愿每吊补贴3、4文或7、8文兑换票币1张。因而，市场上增加了不少换钱摊子，专作换钱生意，养家糊口。

在此时期，清朝政府收回部分制钱，改铸当10和当20两种铜元，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后流入铜仁市场。此种铜元正面分别铸有“大清通宝”和“光绪元宝”等字样，背面铸有龙形图案。这时铜仁各大商号亦印制新票币，票面金额改成“凭票兑当十铜元一百枚整”。

由于票币信誉很高，有些城乡

人民把地方票币储存起来，这使发行票币的商号能够增加流动资金，扩大经营范围，增加利润收入。其它商号见到有利可图，也纷纷发行票币。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票币的商号颇多，较大的商号有傅昶发、黄荣盛、余和生、余德和、黄同丰、义发海、义发冬、余兴和、余永泰、丁永顺、刘义泰、焦金顺、肖定盛、张吉昌和杨锦顺等；中等的商号有朱瑞兴、洪兴德、亿和厚、聂正泰、张洪顺廷、孙盛记、谢长衡、徐广记、宝太祥、黎海兴、聚源长、杨义芳、曾源昌、余泰和、广聚老、徐裕昌、兰永兴、吴元顺、张义盛、王义发东、敦理记、罗洪盛、朱东升、李永泰、杨恒兴、邓和生、杨和顺、丁宝华、熊兴顺、伍正泰等共60余家。这是铜仁地方票币大发展阶段，发行总额约2、3万吊。

二、盛行时期 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十一年（1899—1922年）。光绪末年，银两更加稀少，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一般只有制钱、铜元和票币3种。到宣统年间才流入少量银元，由于银元不多，不能满足市场周转的需要，原来作为辅币而发行的地方票币，逐渐上升为主币。当时对发行票币，没有统一管理，许多商号为牟取厚利，便不顾资本的大小，漫无限制的滥发，引

起了市场混乱。有个别商号，由于资本小，发行票币过多，不能兑现，引起金融风潮，被迫歇业倒闭。如吴文茂南货店，实有活动资金及不动产仅1000多吊，但该店发行的票币竟达1200余吊。一天，一个少数民族老者持票1张去吴店兑现。营业人员正忙于接待其他顾客，见这老者持票不多，便不予理睬，老者多次大声呼喊仍视若无睹。直到空闲时营业员才懒洋洋的伸手接票，同时不耐烦地说：“喊得那样凶，我还以为换好多张票，原来就换这1张，真是烦死人！”。老者受到奚落，便言道：“老板爷！你说话也有点过头了，我只拿来1张票子，嫌少了吗？那好吧，以后我积得多一点再来兑，免得麻烦你老板爷”。

殊不知，这个老者是牛郎乡的大财主，他回家后便开仓拍卖稻谷、桐油等，以低于市价出售，但只收吴文茂商号的票币。约经月余，收集到大批吴文茂商号票币，便用背兜背到吴店兑现。其时吴店生意兴旺，但大部份资金已存在货上，现金不多，一时不敷兑现。于是老者走出吴店，在街上大声呼唤：“吴文茂商号的票子兑不到现，是假票子，是骗人的票子，不信你们去兑兑看！”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凡储存有吴店票币的人，都持票前去索兑。一时吴店人山人

海，叫骂声不绝。吴老板无力兑现，只得被迫停业，宣告倒闭。

在吴店倒闭之前，已有小江口投机商人万洪顺，于铜仁郭家铺设号，发行大批票币，经营桐油购销业务，生意兴旺，盈利不少。但万洪顺利欲熏心，为了发横财，竟将桐油全部抛售，席卷货款潜逃，使持票群众遭受严重损失。接着又发生吴文茂商号倒闭之事，使广大群众，惶惶不安，议论纷纷。一日，又不知从何处传出“傅昶发商号发行的票子太多，1张也兑不到现，立刻就要倒闭了”的消息。引起全城轰动，持票者涌向傅昶发商号兑现，交通为之阻塞。正当傅店感到无力应付，准备宣布停业之际，适逢张吉昌商号四老板路过，因张吉昌号与傅昶发号素有生意往来，利害相关，张即向群众高声喊道：“大家听着！傅昶发商号不会倒闭的，这事我可以担保，请你们放心，兑不到现的人，都拿票子到我的商号去兑。”群众知道张吉昌是个大商号，资金比较充足，听到张老板这样一说，也就相信了，当即散去。

吴文茂商号的倒闭，万洪顺商号的携款潜逃，以及傅昶发商号的受冲击，对票币信誉影响颇大。因此，铜仁知府陈廷梁出面，责令各出票商号，组成5家1联保，1家倒闭，4家承担兑现。经过这次整





•
•
•
•
•
•
•
•
•



顿，地方票币才逐渐恢复信誉。民国2年(1913年)，铜仁县商会成立，统一管理地方票币的发行，仍采用着5家联保办法。同时规定，各发行票币商号，必须以一定数量的不动产作抵押，发行数量也受到一定限制。然后商会在票面上盖“商会验讫”4字，方准使用。这种票币称为“铜仁县商会维持花票”，简称“花票”。不经商会盖章的票币，称为“私票”，严禁使用。不久私票绝迹，市场上只有“花票”流通。经过这一整顿，花票信誉极高。大家认为各发行商号都有财产抵押，又是5家联保，商会又出面负责，自然稳妥可靠，因而“花票”在城乡畅行，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民国4年(1915年)，铜仁商会又直接发行4万吊商会票币，贷给各商号，规定每吊取月息1分2厘，作为商会开支。市场上设有商会票币兑换处，便于群众随时持票兑现。继而江口县商会、省溪

县(现万山区)商会也各自发行票币，投入铜仁市场，也各设有兑换处。民国8年，铜仁地方经费局也以地方经费收入和固定资产作抵押，发行地方经费局票币约2万吊，充作学款(即学校经费开支)。上述4类票币，同时流通于铜仁市场，有同等的支付价值。

铜仁地方票币经过整顿，比较稳定，市场金融活跃，购销两旺。

民国4年以后，吸引不少外省商人，相继来铜仁设“庄”。江西帮有德顺隆、庆元丰、杨恒源，豫恒泰、谦裕隆、永春和、悦盛永、瑞兴永、福兴隆、郭福记、丰茂昌和广聚福。常(常德)汉(汉口)帮有集庆长、刘怡记、刘宝记和戴贵记。湖南宝庆(现邵阳市)帮有金生利、禹天隆、禹佳友和金天成。湖南衡阳帮有封茂恒。贵阳帮有裕黔公司。四川帮有正兴东。这些商号有的还和重庆、汉口商号相互往来，并发行“汉票”和“川票”，作为商号内部汇兑和支付。凡持有这种票证的商人，可以在两个月内，携带汉票去汉口、川票去重庆兑现或兑换百货，花纱布匹、食糖等工业品。通过这种不带现金兑换现货的办法，使发行票币的商号，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汉票”、“川票”也是地方票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通使用。这是铜仁地方票币的极盛时期。

三、贬值和淘汰时期 民国12至15年(1923—1926年)。民国12(1923)年，滇军吴学显部1个团进驻铜仁，并带来一批“广毫”作军费开支。“广毫”本系两广用银铸造，1枚抵银元2角。但滇军带来的广毫多是锑质，以锑充银，群众抵制使用，引起市场金融混乱。商会只得发行3种新票币(100文、200文和500文)，共2万吊，换回锑

质“广毫”(规定400文换广毫1个)，人心始定。13年，滇军离去，湘军蔡巨猷部和川军熊克武部又接踵而至，军需全由商会捐款供应，致使地方负担日益加重。初期，由商会按各商号资本大小分等级捐款维持，继而派及四乡殷实之户。但军方索款不断增多，无法维持。如川军汤予模师驻铜仁时，一次竟向地方摊款20万元，商会又只得另发8万元票币(包括“铜仁粮税抵借券”3万元)，才勉强应付过去。但已引起市场混乱，铜仁地方票币逐渐失去信誉，开始贬值。

民国14年(1925年)以后，为了应付日益繁重的军费开支，商会就漫无限制地滥发票币。初期尚能因袭旧例，规定每张1000文，名为“维持票”，委托石印局代印。后因石印局承印不及，商会就自己购置石印机1部，日夜加班赶印。因票币迅速贬值，军费开支猛增，1部石印机赶印不及，只得破例将票面数字扩大为5000文1张，仍供不应求，又将票面数字再度扩大为10千文1张。如此5倍、10倍的扩大票面数字，又无限制的印刷投放市场，引起通货膨胀，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票币信誉从此一落千丈。在这混乱的局面下，有些早已禁用的私票，如吴熙记、罗济成等商号的私票，也趁机流入市场。这时金融市场更加混乱，物价更加波动。民

国15年，铜仁县政府饬令商会整顿，藉以维持票币信誉，维护军费开支。商会当即商同驻铜黔军负责人吴剑平出面维持，规定票币1000文折合铜元20枚(贬值5倍)，并由铜仁县政府公告施行。不久，公告等于一纸空文，票币还是不断贬值。继后铜仁县政府、县商会和地方经费局联合发行5000文1枚的票币，以及饷捐局发行1元1张的“厘税抵用券”等大钞一出笼，1块银元竟可兑地方票币1000吊(贬值约800倍)。此后，铜仁地方票币，逐渐被湘西银行券、“车币”及其他版银元所淘汰了。

铜仁地方票币由兴盛一时到逐渐走向衰败，直至淘汰。其间，由于通货膨胀，人民群众和部分商号受害非浅。例如“罗志成”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商号，民国15年1月盘点上一年的帐目时，发现14年尚有货款90余万吊，而至民国15年元月，只有10余万吊了。余兴和商号，民国14年上期尚有货款5000余吊，到民国15年1月只有2000余吊。其他商号如张洪德、傅昶发、杨义芳等，均为当时铜仁的大商号，因票币贬值，生意凋零，亏累太大，均先后倒闭歇业。小商杨义胜，在生意兴隆票币稳定时期，以票币在龙鱼地方当有田产二十余亩，当票币贬值时，当主按原价将田赎回，结果“杨义胜”只得了一把废纸。



•
•
•
•
•
•
•
•
•





总之，铜仁地方票币的被淘汰，使城乡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一片混乱，城乡人民遭到一次浩劫。

铜仁商会当制钱壹吊文 1924年5月，贺龙率四川讨贼联军第一混成旅兼四川暂编陆军第九混成旅第一次进驻铜仁。为了安定地方，贺龙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顿市场、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平定匪患、保护邮商，铜仁及周边环境一时秩序井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及商绅的拥护。铜仁商会以会长罗达成为首，集资印发了“铜仁商会当制钱壹吊文”的钞票，为贺部筹建军饷。

利民存款券 民国24年（1935年），王家烈指派驻扎铜仁的柏辉章私设的利民钱庄发行利民存款券，面额为1元，存款券主要用于补军饷之不足。民国25年，柏辉章撤离铜仁，利民钱庄也接着垮台，所发行的存款券便成了废纸。

铜松思石矿务局 民国4年（1915年），铜松思石矿务局总办黄绿贞托名开局需钱甚多，而市面铜圆既少，钱票亦缺乏，请自出钱票，得以维持市面和周转，并拟定了出钱票四万吊，分为：1吊20,000张、500文20,000张、300文10,000张、200文20,000张、100文30,000张。这一呈请得到了贵州巡按的准许。因此，该钱票应该在局内及附近城镇流通一时。

松桃县
据《贵州省档案馆“2”宗249卷》载：“铜元票的流通，民国二十三年在贵州仅有松桃、赤水、遵义发行过”。又载：“在松桃是由饷捐局、教育局和孙裕顺钱庄发行”。其实，松桃钱票盛于民国20年（1931年）左右，发行面宽，数量也大。

松桃县城麻阳街，解放前是一条繁荣、热闹的商业街，大小商号店铺有40——50家。著名的“八大商号”都发行过钱票，他们是徐生泰、涂松泰、周明顺、周吉顺、周恒盛、孙玉顺、刘仁泰、明双和等8家，还有些中小店铺和商家也发行过钱票。如布店、棉纱店、百货店、瓷器店、药店、银匠铺、染匠房，以及卖油、卖盐的，连卖烟酒的都发行过钱票，据说有德裕厚、傅达斋、三合号、邹新记、万海山、林恒春、刘泰安、雷源盛、罗猫头、周茂鑫、童万顺、宝和堂、陆永兴、李荣发、杨怀记、李和记、孙裕顺、吴继常、孙银生、刘二毛、黎大永等；在农村主要集镇大坪、普觉、孟溪、乌罗、甘龙、长兴等地，也有数十家商人发行过钱票。发行额最大的上千元，有徐生泰等大商号；最小的5至10元，有雷银花等小商人。

在松桃流通的钱票中，铜元是发行最多的，币值以“文”、

“串”为单位；发行银元票是少数，以角、元为单位。票面印刷有木刻和石印两种，石印的多数在本县的庆华石印局和茂鑫石印局印制，个别商号去湖南常德石印。石印的纸张一般较好，有花纹图案等装饰。木刻的多在农村流通使用，纸张较粗，花纹图案也很简单。

林恒春银楼发行的铜元票有10,000张，呈长方形，印制较为精美，正面有“林恒春”楷书和篆书两枚印章，中间有椭圆形山水有色图案，四周框边有套色花纹，背面印有“一串文，凭票兑换当百铜元十枚”字样。

徐生泰、周命昌、林恒春等发行的钱票，不仅在本县广为流通，而且在邻近的四川省秀山县，湖南省所里（吉首）、乾州、镇竿（凤凰）、永绥（花垣）、龙溪口（新晃）、麻阳及本省的铜仁、印江、沿河等县也能使用。在长沙、汉口、常德有联络和贸易关系的商号，还能持票兑现或办理汇兑。

红极一时的钱票，先是私印私发，后县商会出面干预，提出“限制票额，查验底本”的规定，大商号串通一气抵制，仍照常印发，小商人无法抗拒，有所收敛或自行停发。

由于钱币发行名目繁多，形色各异，既无准备基金，又无固定财产的担保，所以经常发生不能兑付

的情况。有的商家一旦发生倒闭，就离家躲藏，或卷款外逃，持票人兑付无着，只有自认倒霉。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明令“查禁钱票”后，松桃钱票才停止使用，并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思南县

据民国初年日本同文调查，当地有恒清源、瑞升振两家商号发行钱票。

民国初年，思南就有德顺和等13家发行铜圆票。其中有民国6年（1917年）县城商人张春廷开设的德顺和商号，该号仅有资本数100两，但发行商钞达5000两左右，面额为1串文。该号经营花纱布和山货，发行的制钱票人称“千制票”。1921年，其弟张德汉也发行德顺和钱票，与兄争利。为了识别，张春廷在所发行的钱票上加印“龙”字，其弟发行的则加印“凤”字。因发行过多，兄弟两人逃走，“千制票”成为废纸，商家损失极大。同年，县城商号安茂顺、安茂和、全德源、刘繁谱、张祥兴及唐乔镇盐商陈春和、李应泰、田福泰、黄临元等，相继印发行钱票，在城乡市场流通。

1923年，思南商会会长张跃廷，以周转市面为由，印发了当500文、当1000间的铜圆票。由盐商





担保，作缴纳盐税、盐款之用。商会以现金将钱票收兑，起初信誉尚好，流通顺畅。县城商贾见发行钱票利丰，纷纷向商会申请发行钱票。次年商会规定，“商号印发钱票，必须以该号财产担保，发行额不得超过财产的50%。钱票须经商会盖章，方可发行。”于是，县城同德昌、德胜才、吕裕生、张恒升、李继兴、德胜材、万和生与县经费局纷纷印制钱票在市场上流通。后因川、滇、黔军队过境，索饷频繁，各商号被搜刮一空，无钱兑换。盐商存盐售尽，无钱进盐，市面缺盐，人心惶恐。商会乘机宣布：“市面有人伪造商会钱票，凡市面钱票，一律停止兑换。”各发行钱票商号纷纷效尤，或关门倒闭、或避而不见，所有钱票均成废纸，持票者无不唾弃，有的更因此而倾家荡产。

1924年，思南驻军旅长谢佩生强迫民间使用“尾巴票”。商会又加印钱票，以应付军阀部队。不久，商票全部停兑，商店关门，人民损失惨重。

1940年6月，思南县政府以辅币太少为由，印发了“小额流通券”2000元投入市场，流通时间很短。

印江县

印江地处贵州高原东北的边远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

加上军阀割据，国家发行的纸币长期流通不进来，市场上还是用铜钱作为交换货币，很不方便。1926—1928年间，徐泽生担任印江商会会长，他领导和管理商会工作有成绩，商会工作深得政府的重视。为了发展商品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商品流通，商会请示县政府批准，由商会印制和发行了货币。这种货币是用本县合水地方造纸户专门生产的纸质较好的特制夹皮纸，用石印印制的。纸币上印有印江商会长的印章，在印江县内城乡市场普遍流通。它具有货币的基本职能，工人农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可以用来购买商品，支付赋税、

工资、租金和付债。这种货币在印江县城乡市场上使用了2年时间，国家货币流通到印江后才停止使用。

江口县

民国10年（1922年），江口县商会为应付筹集地方军阀所派粮款，制发“墨票”（俗称“墨飞”），石版印刷，面额为制钱1000文，分为竖式和横式两种，后发行量增加，改为木版印制。“墨票”限于县城使用，为时不长。

民国35年（1946年），江口县商会鉴于法币与关金券不受欢迎，银元、铜元又严重不足，为使商品

流通顺畅，乃发行商钞——街票，限于县城流通。“街票”用毛边纸印制，长宽为17厘米×7厘米，面额为1元、5角、2角。

江口融通票 民国时期，江口县商界以类似支票的融通票流通于商业资金周转，又称“川票”。县内商人需到辰溪、常德、汉口购货时，可到上述地点设有庄号的县内商店购买川票，计付一定利息，然后持票到达所在地点庄号兑现现金。

玉屏县

民国35年（1936年），县商会鉴于法币与关金券不受欢迎，市场上的银元、铜元又严重不足，为便于交易，乃发行“街票”，限于县城流通。“街票”用毛边纸印制，尺幅为17厘米×7厘米，面额有2角、5角和1元3种。

省溪县（今属万山特区）

民国3年（1914），省溪县商会自印“商钞”，有竖版和横版两种，在市面流通。

民国14（1925年），省溪明兴公司发行有面额为1元的兑换券在市场流通。兑换券正面有黎元洪头像和火车图样。

沿河县

民国初年，沿河有商号发行铜

圆票。



贵州矿务局万山厂光绪二十七年1串文（正背）

规格：85x227mm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盐道陈明远创办贵州矿务局，开采清溪铁矿和兴义、开阳、八寨（今丹寨县）、铜仁4处汞矿，陈向法商瑞记洋行借款20多万元，建立英法水银公司，引进先进的设备，获利达400万元之巨，该公司在发放工资时，还搭放公司发行的银票和铜仁府发行的商钞。

该票是“英法水银公司”在万山（今贵州省铜仁地区万山特区）设厂的历史见证；又是“奏办”贵州清溪铁厂，成立“贵州矿务（工）商局”的历史见证。





民国27年松桃麻阳街姚万顺凭票兑市钱1串文（正背）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贵州裕黔公司当制钱1000文带存根 正面

据老年人回忆，裕黔公司设在今贵阳中华南路口，且在铜仁县城也有分号。



民国14年贵州省溪县明兴公司洋光兑换券1元（正背）
此钞为2009年北京·中国历代纸币展之重要参展品之一
北京牛进先生典藏



民国14年铜仁粮税抵用券1元（正背）



铜仁商会当10铜元10枚 正面
贵州铜人藏



铜仁商会当10铜元20枚 正面
中国嘉德2012年春拍 王士平收藏 纸钞专场
成交价（人民币）：1495



民国8年贵州铜仁商会验讫松柏长铜元票100枚85成新（正背）
北京诚轩2014年秋拍——纸币专场

参考文献：

戴建兵编《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

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编，《贵州省志·金融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社，1998年5月出版。

贵州省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

田志军主编；贵州省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铜仁市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思南县金融志》编撰领导小组编，《思南县金融志》，1991年12月出版。

松桃苗族自治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松桃苗族自治县金融志》（1975—1990），1996年7月出版。

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委会编，《石阡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贵州省江口县志编委会编，《江口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编委会编，《玉屏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中国钱币学会贵州省分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贵州钱币资料》第2辑，1986年出版。

贵州省万山特区地方志编委会编，《万山特区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96年12月出版。



道光宝黔小平行用钱版式综述

■ 黄雅迪

清代中后期道光铸币中，宝黔小平铸币版式应该最复杂和最值得研究的领域。原因有三，其一，道光宝黔铸币存世小平大部分比较厚重，区别于其他同时期的铸币局铸币，形制规整、文字清晰便于研究；其二，道光宝黔铸币背后符号复杂多样，意义不明有待研究；其三，道光宝黔铸币大多颜色泛红，含铜量比较高，在银贵钱贱，铜矿资源日趋产量低下的大时代背下，独树一帜。

道光宝黔小平铸币从目前存世实物上来看，除民间私铸或后期官局减重铸造外，一般都直径24.5mm以上，达26mm及以上的稀少。从文字上可分为五大类，一类是地方式不挑“光”和挑“光”薄小型面文体系

如图：



地方式不挑“光”和挑“光”

薄小型面文体系



地方式异书工头通面文体系

第一类部颁式双点方头通面文体系版式比较单一，配部颁宝黔满文标准背。直径在25.5mm左右的属于部颁式铸币，存世较少，直径在26mm以上的属于部颁式铸币初铸币或样币（相比普通币，需要加工工艺及文字清晰度更高），而其中直径26.5mm以上的更加稀少，可遇不可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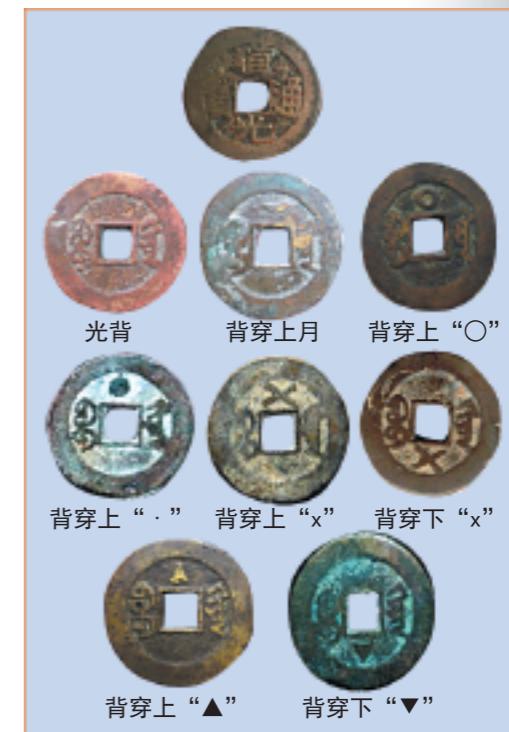


部颁宝黔满文标准背

第二类是仿部颁式爪三角通面文体系，目前发现版式有光背，背穿上正月，背穿上“大”，背穿下“匕”，背穿下“·”，背穿下横杠。其中背穿下“匕”较少，背穿下“·”少，背穿下横杠稀。



第三类是地方式挑“光”三角通面文体系，目前发现有光背，背穿上月（有正月，仰月，长月，俯月，横月等小变体），背穿上“○”，背穿上“·”，背穿上“x”，背穿下“x”，背穿上“▲”（有正，仰，俯等小变体），背穿下“▼”（有正，仰，俯等小变体）。其中，背穿下“x”和背穿下“▼”较少，背穿上“·”少。



第四类是地方式不挑“光”和挑“光”薄小型面文体系（多为轻薄型，后期铸造）。其中变体小版众多，满文黔写法也和其他版式不同，大多直径在24.5mm以下，现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后期官局所铸造的此类币存世量不多。



第五类是地方式异书工头通面文体系。目前发现三个版式，



除版式2嘉庆手（有类似面背文的



嘉庆通宝宝黔)较为多见，存世量较少外，版式1和3存世量应该在“珍”这一级别。

综上所述，结合笔者收藏所见，道光宝黔铸币版式中，部颁式大样26mm以上铸币和地方式异书工头通类铸币最为稀少，其余版式按照珍稀度从高到低应为：部颁式25.5以上至26mm铸币，穿下横杠，穿上“·”，穿下“·”，穿下“匕”，穿下“x”，穿下“▼”，穿上“大”，其他品种存世量较多。至于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笔者结合清代其他带有符号的小平钱，如乾隆宝武背星，嘉庆宝黔背一，背二，咸丰多局带符号钱币等猜测，此类带符号铸币为道光宝黔局铸币炉记的一种标记，标

记不同铸币炉，区别不同炉别，便于统计不同铸币炉生产的产量和质量，便于加强管理和统计分析之用，但史料缺乏，静待后来研究者补充说明。截至目前，道光宝黔小平行用钱版式还时有新发现，例如背穿下横杠就是近年新发现披露品种。期待藏友发现更多新的道光宝黔品种，为贵州宝黔局铸币研究的深入开展添砖加瓦。本篇综述结合个人收藏经验难免以偏概全，疏漏失误之处敬请泉友指导斧正。(文中所用图片，除笔者藏品图外，借用了古泉园地等网站图片，仅作为研究用途，特此说明)

作者：

黄雅迪(中国钱币学会会员、
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征稿启事

ZHENGGAO

《贵州钱币》学术研究和钱币知识普及并重，雅俗共赏，既需要有深度的专论，也需要有可读性的短文，要求来稿图文并茂，其中专论5000字以内，数字图片600万象数以上。

《贵州钱币》开辟栏目有《钱币专论》、《收藏鉴赏》、《钱币文化》、《防伪反假》、《泉海杂谈》、《往事漫忆》、《货币史研究》、《钱币真伪》、《投资分析》、《泉界动态》、《钱币之窗》、《币史钩沉》、《我与钱币》等。欢迎投稿，稿费从优。

来稿请寄地址：贵阳市富源中路318号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2楼 贵州省钱币学会秘书处收(请勿一稿两投)

邮编：550002 电话：0851-83921722

Email: 3240856288@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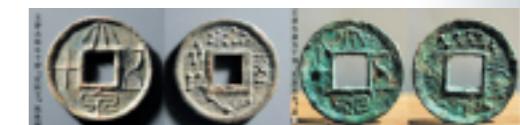
东汉末“将主袁公”钱浅考

■ 王子华

近日笔者收藏了一枚东汉末期的钱币，币文“将主袁公”。该币生坑大开门，直径2.05CM，文字篆书旋读。观其钱币整体风格和使用痕迹，与东汉末的“剪边五铢”无异，当属“行用钱”范畴。文字书写也附和东汉时期的篆书钱文写法。纵观已发现东汉花钱系列中此类题材属首见，再往前推至王莽、西汉时期，也未曾发现此类题材之钱币。



在探讨这枚钱币之前，我们先了解下早期花钱。我个人认为我国的早期花钱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别，一是行用钱类别，钱币本身广泛参与流通，但在行用钱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的文字、图案。如：吉语、宗教、星象等，它的特点是钱币不仅有行用钱使用特征，而且风格与当时期的钱币基本一致。



二是民俗钱类别，钱币不参与或是不广泛参与流通，内容没有当时期的行用钱文，只是吉语、宗教图案、民俗图案等。有的这类钱币根据形制特点和文字内容又可以分为多个类别，本人不擅长民俗花钱的研究收藏，在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

早期花钱(汉花、莽花)比较难得一见，特别是参与流通的行用花钱就更为稀少，一直是藏家所重点追寻的藏品。关于早期花钱的介绍考证也是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光华钱币博物馆馆藏此类花钱较为丰富(特别是王莽时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参观了解。

回到这枚东汉末的“将主袁公”钱，其钱币风格和东汉末期的剪边钱(铸造之剪边钱，非人为之剪边、延环)一致。





细看钱币，应该归为花钱的范畴。该币有早期使用磨损之痕迹，应为当时流通后入土之物。虽然无行用钱的钱文，但在当时应属于流通之行用钱。就目前的汉代花钱的发现而言，这枚钱币非常特殊，从文字内容上有别于以往所有汉花，不属于以往吉祥语、宗教以及天文星象所表达的意思。这枚钱的文字

“指向性”特别明显，像是在说明一个事件。我们从这枚钱币的钱文来进一步探索考证，四个字的译读“将”、“主”、“袁”、“公”已无异议。读法也只有旋读才能词语通顺。但有意思的是旋读有两种读法都说得通，一是如果以将字开头，将读第四声“将主袁公”，从文字上解释为“袁公作为众将之首领”。二是如果以袁字开头，将字读第一声“袁公将主”，从文字是解释就大不一样了，可以解释为“袁公将要成为皇帝”。首先钱文内容都指向一个人“袁公”，我们要搞清楚袁公为何人？在我国，南北朝以前普通人是不能称“公”，公是古代官方最高官位的通称。

《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亦为三公。笔者查阅大量历史记载，发现最早被称为袁公的是东汉大臣“袁安”（？—公元92年），其后代是东汉汝南的世家大族。东

汉末年的“袁绍”（？—公元202年）是其直系后人，袁绍被称为公多见于史，其部下也称其为“袁公”。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袁绍拥有青、冀、幽、并四洲，汉献帝迫势封袁绍为太尉和大将军等职，位列三公，因此史书多次称袁绍为袁公）袁绍曾经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另一位在东汉末期有可能称为袁公的就是“袁术”（？—公元199年），袁术是袁绍之弟，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称帝，但未受承认。此枚钱币从铸造风格形制确定为东汉末期之物，也就说东汉中早时期的袁安可以排除，那钱文所指的袁公，应该就是东汉末期的袁绍、袁术两兄弟。

该钱文中的“将”在古文里有三重含义，一是名词“将领”的意思，二是动词“驾驭、统领”的意思，如：韩信对汉高祖说：主上善将将。前一个将是驾驭、统领的意思，后一个将则是指将领的意思。三是“将来、将要”的意思。结合钱文来看，第一种读法为“将主袁公”，意思应该是：袁公（袁绍、袁术两者一）作为众将领的统领者。第二种读法为“袁公将主”，意思应该是：袁公（袁绍、袁术两者一）将要成为新皇帝。第一种读法里的袁公更倾向于是“袁绍”，他曾经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被推

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这样看来似乎更接近钱文所体现的内容。第二种读法更像是“谶讳”特征。在汉代谶纬、玄说非常流行，在某个物件、钱币上出现了隐含的意思，当事者“托古人意”说明将要做的事是“顺从天意”。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就用朱砂在一块白绸子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进别人用网捕来的鱼肚子里。戍卒买鱼回来煮着吃，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他们通过“谶纬”来获取士兵的人心，随后发动了起义。另一个例子是西汉末的王莽，西汉末期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已经作为代天子执政的“摄政”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匱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王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在已发现的王莽时期货币里，就有疑是“谶纬”所用的大泉五十。（王莽认为其王姓来源于陈，他是黄帝之后人，所以该枚钱币的钱文上铸有“黄帝陈”，另一枚文字直接为“黄帝予王”通过谶纬的办法，向老百姓说明他当皇帝是“顺从天意”）。



回到“将主袁公”钱币来说，在当时谶纬流行的时期，也很有可能是按照第二种读法“袁公将主”作为谶纬之用的钱币。而袁公中的另一个“袁术”，曾经称过帝，会不会这是他在称帝前所铸造的谶纬钱？这样看来，就出现了三种可能，第一种（讨董说）可能是该钱为“袁绍”所铸，“将主袁公”符合当时袁绍作为各路诸侯讨伐董卓的盟主地位。第二种（讨董谶纬说）可能还是袁绍所铸，但是在“将主袁公”的情形下，袁绍是不是含有“袁公将主”取代汉室的想法？从而故意在钱文里隐含了谶纬的意思。第三种（谶纬说）可能是该钱为“袁术”所铸，在袁术称帝前是不是用“袁公将主”铸造为钱币文字，预言其称帝的谶纬钱。笔者为此疑问特意请教了历史学教授陈兴中老师，教授倾向于第一种“将主袁公”但否定了“讨董谶纬说”，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袁绍不可能有代汉的心思，而且引领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就是为匡扶汉室，他断不敢有代汉的心思表露出来。教授认为，“将主袁公”的意思应该更为贴切些，在当时应该是盟军用于“扩充军费”或是“用于





纪念”性质的钱币。教授认为虽然倾向于袁绍所铸的“讨董说”，但是袁术所铸的“谶讳说”也无法否定，毕竟袁术有过称帝的行为。

东汉末期的这两位“袁公”一位做过盟主，一位称过帝，也就是说这枚钱币所指向的事件两者皆有可能。目前这枚钱币的考证还在深入进行中，期待将来有更多的证据能大致判别它是二袁中的哪一位所铸造的，也希望泉友们能参与到这

枚钱币的探讨中来，发挥各人的真知灼见一起解开这个谜团。

无论是讨董说还是谶讳说，这枚钱币都有着极深的寓意，它反映了在那个动荡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此钱币目前没有发现有类似的，足以说明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作者：

王子华（光华钱币博物馆馆长、贵州省钱币学会副秘书长）

近代钞票上的银元初探（中）

■ 叶真铭

四、近代钞票上银元的特点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银元的广泛流通使用，官办、民间机构发行的各种钞票上开始大量采用银元图案作为票面主题图案，以此标明钞票币值，昭示信用。根据笔者初步研究，近代钞票上出现的银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 近代钞票上的银元种类繁多。

近代钞票上曾经出现过的银元品种很多，不仅有1元面值主币，也有1元以下面值辅币。据笔者所见，晚清民国时期主要的流通银币在近代钞票上都出现过，其种类

有：



光绪31年广东钱局银元票1元

(1) 晚清龙洋银元。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东省最早设立钱局，铸造正面中心为“光绪元宝”字样、背面中间为蟠龙图案的广东光绪龙洋银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立广东官银钱局，仿湖北官钱局发行银元票，无论是成

元票，还是毫子票，票正面都有“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广东光绪龙洋银元)正背面图案。如前述光绪二十五年湖北银元局发行的壹大元银元票，票正面有湖北省造光绪龙洋银元正背面图案。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恒昌银号发行的1元面值银元票，背面中间有一枚“北洋造·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背面图案。



宣统北京恒昌银号1元

(2) 袁世凯像银币。该银币因币面上有袁世凯半身侧面像，故而俗称“袁大头银币”，是民国时期主要流通货币之一。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成为正式大总统。为了巩固国内政局，发展民族经济，1914年2月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

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铸造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的银币。袁大头银币铸造时间从1914年至1951年，总发行量超过7.5亿枚，成为民国时期流通最为广泛的货币。如图1中南银行1927年1元券上有民国三年版袁世凯像银币图案，票正面为袁世凯像银币的背面图案，票背面有袁世凯像银币的正面图案。民国年间福建省宁德县三都信孚字号发行的1元面值银元票，票背面正中央有1枚银币图案，即为民国三年版袁大头银币正面图案。大中银行发行的1932年1元券，票背面正中央有1枚银币图案，银币上有面值“壹圆”及嘉禾图案，为袁世凯像银币背面图案，因无铸造年份文字，不知该银币铸造年份。



大中银行1932年1元券(背)

(3) 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鼓铸民国开国纪念银币，正面图案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肖像，背面中间绘五谷图案，“取





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但该币铸时短暂，因孙中山去职而停铸。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铸造。因此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版别较多，按背面花星形状、位置不同，可区分为下五角星、上五角星和六角星3种版别。民国十七年（1928年）福建省福安县穆洋永原钱庄发行的1元大洋票，正面面额“凭票支大洋壹圆正”文字下方有1枚银币图案，即为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的背面图案，银币中间有面值“壹圆”字样及双秉嘉禾图案，四周环绕英文，边饰六角星花。六角星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是1927年后南京、天津诸造币厂铸造的，铸造量较大，流通较广。

(4) 孙中山像船洋银币。1933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令》和《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将银币铸造权收归中央，由设在上海的中央造币厂铸造一种新式银币——“船洋”银币作为银本位币。“船洋”银币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半身侧面头像，上方有铸造年份“中华民国二十X年”；背面图案是双桅帆船放洋图，帆船左右分列纪值文字“壹圆”两字。“船洋”银币设计新颖，铸工精湛，发行后在市场上深受民众欢迎，在我国近代发行的上千种老银币中，其影响仅次于袁大头银币。该银币铸造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为止。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银行发行的天津地名“马耕地”图案券，票背面中央有1枚船洋银币，为银币背面双桅帆船放洋图案及面值“壹圆”字样。中国银行1935年上海地名天坛图案券、1936年天津地名券、1936年无地名孙中山像券，背面都有1枚船洋银币双桅帆船图案出现。1949年南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恢复银本位制，发行银元兑换券（简称“银元券”）以取代早已崩溃的金圆券。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银元券，背面中央都有船洋银币背面“双帆船”图案出现。

(5) 外国银元。除了我国自铸银元，近代曾在我国流通使用的

外国银元也被采用为钞票图案。如清光绪己巳年（光绪五年，1879年）安徽省桐城县同兴福号钱庄发行的本洋1元券，票背面中央有2枚银元图案，银元为西班牙1808年发行的本洋双柱银元正背面图案。西班牙本洋银元是最早在我国流通使用的外国银元。西班牙本洋银元分为“双球”和“人头像”两种。1732年开铸前者，1772年开铸后者。西班牙本洋银元于16世纪中叶流入我国。17世纪末（1684年）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建立商铺，由中国输出茶叶、丝绸、陶瓷、大黄及其他中国产品，多以西班牙银元支付，因而西班牙银元在中国大量流通。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记录，1681年至1833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6800万两以上，合银元1亿枚，其中绝大部分是西班牙本洋银元。



1808年西班牙双柱银元(正背面)

(6) 出现于近代钞票上的银元，不仅有1元主币，也有1元以下辅币。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福建省福清县里美仁记商号发行的2角流通券，该票是福建百城公司印制的，背面中间有两枚并排摆列的银币图案，银币上有面额“壹

角”、“每十枚当一圆”字样以及交叉双旗图案。民国十九年（1930年）福建省福安县上马头合和正记商号发行的大洋5角票，正面中央竖列面值“凭票支大洋伍角正”文字，下方有5枚叠加放置的银币图案，银币上有面额“壹角”、“每十枚当一圆”字样以及交叉双旗图案。据考，这两张钞票上的银币图案都来源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福建省铸造的总理纪念币一角型银辅币背面图案。

2. 近代钞票上出现的银元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特征。

(1) 清代晚期各省发行钞票上的银元图案，大多采用当时当地铸造流通的银元正背面图案作为钞票主题图案，因此根据钞票上的银币图案，就可初步判断该钞票的发行年代和发行地区。

如前述光绪二十五年湖北银元局发行的壹大元银元票，票正面即以湖北本省铸造发行的“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龙洋银元正背面图案作为主题图案。

晚清广东官银钱局发行的银元票，无论是成元票，还是毫子票，票面上都有广东省铸造的“光绪元宝”龙洋银元正背面图案。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官银钱局发行的成元10元票，由日本帝国政府印刷局印制，印刷精美，图案丰富，票面标注“通用成元出入一





律”，正面中间为面值文字“拾元”，两侧分别有“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正背面图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江南裕宁官银钱局发行有银元钞票1元、5元券，票背面中央双龙戏珠图像两侧各有一枚本地铸行的江南省造光绪龙洋银元图案，正背面图案各一枚。据考，此银元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设于南京的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东厂最早铸造的无纪年江苏省造光绪银元（即俗称的“老江南银币”），币正面有“江苏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字样，珠圈两侧为花星图案，无干支纪年文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安徽巡抚诚勋奏设安徽裕皖官钱局，资本额十万两，初为官督商办，后改为官商合办，最后收归官办。最初发行制钱票壹千文一种，与铜元并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发行银元票，有1元与5元两种面值，由商务印书馆印制。5元券为直式设计印刷，券正面最上方有发行单位“安徽裕皖官钱局”字样，下方左右两侧各有一枚安徽本省铸行的“安徽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安徽光绪龙洋）图案，右为银币正面图案，左为银币背面图案；面值1元券，横式设计印刷，券正面中间为面值文

字“壹圆”，两侧各有一枚本地铸行的安徽省造光绪龙洋银元图案，正背面图案各一枚。



光绪33年安徽裕皖官钱局1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天津万义川银号发行的天津通行银元1元票，正面中间为面值“壹圆”字样及双龙戏珠图案，背面有“天津通行银元”及“万义川记”字样，票面中央有1枚银元图案，上有蟠龙图案及英文字母。据考，该银币为“北洋造·光绪二十九年·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背面图案。北洋造光绪元宝银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的“北洋铸造银元总局”所铸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式开铸

“北洋造·光绪二十九年·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该年份只铸七钱二分一种，发行量较大。此后又铸造了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版北洋造光绪元宝银元。如宣统年间北京顺治门外骡马市街长发厚银号发行的2元面值银元票，背面中央有2枚相互叠加的银币图案，该银币即为“北洋造·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元宝·库平

七钱二分”银币背面图案。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恒昌银号发行的横式钱庄票1元券，票背面有光绪三十四年版北洋造光绪元宝银元图案。宣统年间北京同心银号发行的3元面值银元票，其上的银元图案也来自北洋光绪34年银元。

（2）民国时期钞票上的银元图案，一般也以当时当地最主要的流通银元正背面图案作为主题图案。如前所述，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泛的几种银币，如袁世凯像银币、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孙中山像船洋银币等，都曾经出现在当时发行的钞票上。

此外，民国时期发行的钞票也有采用当时当地铸造的流通银币正背面图案作为钞票装饰图案的。如民国十四年（1925年）福建省福安县合泰信钱庄发行的小洋一角钱庄票，直式设计印刷，大幅精美，票背面图案下方有1枚银币图案，银币上有“福建官局造”、“壹毫银币”、“库平七分二厘”等文字。据考，该银币是民国时期福建地方铸行的1毫银辅币，正面中央圆星，环列“壹毫银币”，珠圈外有“福建官局造”、“库平七分二厘”，左右分列四瓣花星；背面中央纪值“10”，珠圈外有英文“福建省”、“七分二厘”，左右分列四瓣花星。直径18毫米，重2.62克，成色七成。另见“福建官局

造”贰毫银辅币存世。目前对于这两种银币的铸造时间、铸造背景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它们是民国初年福建造币厂试铸样币。辛亥革命时期福建都督府成立之初，急需用钱，而模具又未审定，福建造币厂自行设计，仍沿用前清时期“福建官局”名称试铸的样币。其铸造时间可能在民国元年之初，或是“民国纪念币”同一时期的产物。^⑤另一种说法见于网络，认为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海军部长杨树庄兼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后，批准海军马尾造船所承办省政府银元局铸造银辅币，开铸“福建官局造”贰毫银币、壹毫银币。^⑥但从这张福建福安县合泰信小洋一角钱庄票实物分析，笔者以为上述两种说法都不可信。一是钱庄票发行时间为民国十四年，票面上已经出现“福建官局造·壹毫银币”图案，可见“福建官局造”贰毫、壹毫银辅币当在民国十四年或以前即已铸行。因此民国十六年杨树庄批准海军马尾造船所铸行之说不可信。二是“福建官局造·壹毫银币”能够成为钞票票面图案，说明该种银币社会大众认知程度较高，其应是在当时当地流通较为广泛、影响力较大的货币。如其为民国初年试铸样币，没有参与过市场流通，不为人所知，很难想象其图案为何在10多年后还会在流通钞票上出现？因此





•

•

•

•

•

•

•

•

•

•

•

•

•

民国初年试铸样币之说也值得商榷。



总理纪念币民国16年壹角

民国十九年（1930年）福建省宁德县义宁钱庄发行的大洋票3角券，票面竖式设计印刷，正面中间竖列面值“凭票支大洋叁角正”字样，背面主题图案下方有3枚相互叠放的银币图案，银币中央有交叉的双旗图案，上下分别有“壹角”及“每十枚当一圆”字样。据考，此银币为民国十六年（1927年）福建银币厂铸造的总理纪念币壹角银辅币背面图案。总理纪念币壹角银

币正面中央为孙中山正面肖像，上有以六瓣花星分隔的“中华民国”、“十六年造”、“总理纪念币”字样；背面中央有交叉的国民党党旗和民国国旗，中结带，上下分别有“壹角”、“每十枚当一圆”，左右各有6圆星。直径17.5毫米，重2.6克，成色七成。民国十六年以后发行的福建民间私票，常见以总理纪念币1角银辅币背双旗图案作为钞票装饰图案。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福建省福安县穆洋洪泰方钱庄发行的2角流通券，背面中央也有两枚本省铸造的总理纪

念币1角银辅币背面图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福建省古田县平湖簇同荣钱庄发行的2角流通券，背面中央主景图案两侧各有1枚银币图案，均为总理纪念币1角银辅币背面图案。前述民国十九年福建省福安县上马头合和正记商号大洋5角票、民国二十年福建省福清县里美仁记商号2角流通券，钞票上也有总理纪念币1角型银币背面图案。

3.近代不仅官办机构钞票上有银元图案，民间钱庄、商号发行的地方私钞也以银元图案作为钞票图案。

如前述光绪年间天津民营万义川银号发行的天津通用1元银元票，背面中央有北洋造光绪二十九年银币背面图案。

光绪己巳年（光绪五年）安徽省桐城县同兴福号钱庄本洋1元券，票背面中央有西班牙1808年发行的本洋双柱银元正背面图案。

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恒昌银号发行的1元面值银元票，背面中间有一枚“北洋造·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背面图案。

宣统年间北京广源银号发行的10元、5元、1元银元票，背面中央都有北洋造光绪三十四年银币背面图案。

宣统年间北京同心银号、同合

公银号发行的银元票，票面也出现银币图案。

民国十四年（1925年）福建省霞浦县鸥港协丰商号发行通用小洋票，面值“叁拾角”，较为少见，背面中央有3枚银币图案，均为民国三年版袁大头银币正面图案。



民国14年福建霞浦鸥港协丰小洋票30角（正背面）

民国十五年（1926年）福建省福安县穆洋通大钱庄发行的1元钱庄票，竖式设计印刷，正面中央有面额“壹圆”字样，下方有1枚袁大头银币背面图案，银币上有面额“壹元”字样及两束嘉禾图案。

民国十八年（1929年）福建省永泰县逸珍汇兑局发行的银元票1元，背面中央有1枚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的背面图案，银币中间为面值“壹圆”字样及双束嘉禾图案，四周环绕英文，边饰六角星花。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福建省宁德县恒盛亨钱庄发行的5角大

洋票，票面竖式设计印刷，正面中央竖列“凭票支大洋五角正”字样，下方有5枚相互叠放的银币图案，银币中央有交叉的双旗图案，上下分别有“壹角”及“每十枚当一圆”字样，为民国十六年福建银币厂铸造的总理纪念币壹角银辅币背面图案。

民国时期山东省临朐县城西上石阜隆茂盛商号发行的2角银洋券，票背面中央有两枚银币图案，银币上书面值“贰角”字样及交叉嘉禾图案。

民国二十年（1931年）山东省益都县城南井亭子昌盛号发行的五角票，票背面中间有1枚银币图案，银币上有面额“伍角”字样及两束嘉禾图案。

民国二十年（1931年）山东省乐陵县城内庆兴号发行的国币1角流通券，正面左侧有1枚银币图案，银币中央有面值“壹角”字样及交叉嘉禾图案。



山东乐陵庆兴号1角庄票

作者：

叶真铭（中国钱币学会会员、福建省钱币学会理事）

•

•

•

•

•

•

•

•

•

•

•

•

•

清代龙凤纹大花钱寓意吉祥

■ 宋康年

笔者最近在一位钱币藏友家见着一枚清代龙凤纹大花钱，质地黄铜，晶莹锃亮，圆形圆孔，阔缘，浮雕，直径5.8厘米，正面为一条腾空升飞的龙，张口旋身。背面为一只色彩斑斓的凤，翩翩起舞，周围云朵，花卉，显示着一派祥和之气氛，其图象简约概括，富有艺术韵味。（如图）



在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中，龙凤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一种纹样，由于它寓意吉祥，因此，它在古代各种器物上出现，屡见不鲜，当然，钱币也不例外。据考：陕西宝鸡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龙凤纹彩陶细颈瓶，说明龙和凤都起源于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期，而且它们是同步的。作为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标志象征。如果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按其功能效应的大小排个座次的话，

龙无疑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那么第二位就该是凤了。古人认为龙是百兽之君，凤是百鸟之王，它们一个是变化飞腾的灵异，一个是高雅美誉而吉祥，两者之间的美好的互助的合作关係建立起来，便有“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另外龙和凤配合，结合，对应，反映着古代人们的阴阳观，说明古人已认识阴阳是不同的，相对的，又是相关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哲理，龙凤又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神物，它体现着人民群众美好愿望，表现在语言上，就有“龙飞凤舞”，“龙章凤姿”，“龙眉凤目”，“龙凤呈祥”等，除此，人们还形容夫妻间的比翼双飞，恩爱相随，相濡以沫，和合百年的忠贞爱情。

总之，这枚清代龙凤纹大花钱，不仅质地优良，制作精美，寓意吉祥，反映着人们对美好的追求，而且其浮雕，是以雕塑与绘画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在小小的钱币面上，展现着大美世界和无限的思想空间，更是其难能可贵之处。

作者：宋康年（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安徽望江县博物馆研究员）

贵阳中支成功举办全省人民银行系统反假货币知识与技能竞赛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

为充分调动和激发贵州省人民银行系统反假货币业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反假货币业务人员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更好的履行反假货币职责，2017年8月21日至22日，贵阳中支成功举办了贵州省人民银行系统反假货币知识与技能竞赛，贵阳中支以及全省8个市州中支共9支参赛代表队27名选手参加了竞赛，贵阳中支党委委员、副行长肖杰，贵阳中支党委委员、工会主任樊薇出席了竞赛活动。



本次反假货币知识与技能竞赛分为两个阶段，8月21日下午，第一个阶段比赛在贵阳中支296会议培训中心进行，第一个阶段比赛分为反假货币理论知识笔试答题与手工识

假竞技两个环节，肖杰副行长、樊薇主任亲临现场进行监考，反假货币理论笔试答题阶段，参赛的27名全省反假货币业务尖子沉着迅速的进行着作答，理论考试范围涵盖人民币发行、人民币反假防伪、外币鉴别等多个方面，内容广阔丰富，本环节筛选出了笔试答题成绩前9名参赛选手进入第二阶段个人现场竞答；笔试答题后是手工识假竞技，规定每个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三百张纸币中正确的挑剔、鉴别出假币，难度系数较大，当裁判员宣布开始的那一刻起，手工识假竞赛就紧张激烈的开始了，参赛选手们争先恐后、争分夺秒，监考组的裁判员们一对一的对参赛选手们进行计时和监考，考场严肃有序。

8月22日上午，第二阶段的竞赛在贵阳中支三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分为个人现场竞答和团体竞答两个环节，肖杰副行长在现场向参赛代表队和人民银行的干部们致辞，他对开展好本次贵州省反假货币知识与技能竞赛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





竞赛只是一种手段，要以此为契机，充分调动和激发全省人民银行反假货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强化反假货币知识与技能，将理论学通透，将技能练精通，将业务做扎实，形成“学知识、练技术、比技能、创一流”的良好工作格局；二是要通过竞赛活动，进一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要不断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断夯实自己的综合素质，做到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成才；三是要通过竞赛活动，进一步强化创先争优能力，进一步树立起“立足岗位比贡献，建功立业争一流”的理念，将创先争优、奋勇争先的精神气带到竞赛中来，体现到今后的工作中去，切实增强责任感和荣誉感，争取在不久的全国竞赛舞台上展现出亮丽的“贵州风采”。

个人现场竞答由第一阶段选出的笔试答题成绩前9名进行竞答比赛，团体竞答由每个中支派出3名选手组队进行合作答题，主持人以



PPT展示、现场提问的方式出题，参赛选手们积极作答、踊跃抢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经过激烈的竞赛，六盘水中支、黔西南州中支、黔南州中支三支代表队分别荣获团体奖前三名；黔东南州中支代表队的丁建、何登陆，贵阳中支代表队的徐瑶分别获得个人全能奖前三名；贵阳中支的徐瑶、黔东南州中支的丁建、六盘水中支的霍晴分别荣获个人手工识假前三名；黔东南中支的何登陆、刘燕琼，六盘水中支的杨厚东分别获得个人现场竞答的前三名。肖杰副行长、樊薇主任、工会办主任王天均分别向团体前3名、个人全能前3名、个人单项（个人现场竞答与手工识假）前3名颁发了获奖证书，并对获奖代表队与获奖选手表示祝贺，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奋勇争先、不骄不躁的作风，在全国的竞赛舞台上代表贵州省人民银行系统取得好成绩。

贵阳中支举办贵州省首家反假货币示范县创建启动仪式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

9月28日，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在黔南州瓮安县隆重举办贵州省反假货币示范县创建启动仪式。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黔南州中心支行、瓮安县政府相关部门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领导参加了启动仪式。



瓮安县反假货币示范县建设，是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贯彻落实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精神、积极推进贵州省反假货币工作转型的具体体现，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安全和谐人民币流通环境的重要举措。

人民银行、瓮安县政府主要领导对瓮安县创建全省首家反假货币示范县现场致辞，贵阳中心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肖杰同志在致辞中强调了反假货币工作转型发展的重大意义，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省反假

货币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反假工作面临的形势，并对示范县创建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抓好示范县反假货币工作；二是要明确目标，建立“一平台四机制”反假工作体系，达到假币犯罪率显著下降，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的目的；三是要凝聚合力、抓住关键、善于总结，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工程。

随后，人民银行和瓮安县政府等相关领导共同按下启动球，宣布“瓮安县反假货币示范县建设”正式启动，并对“反假货币示范县工作站（点）”、“货币鉴定中心”、“普惠金融服务点”进行授牌。

启动仪式后，人民银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领导和志愿者在瓮安县集中开展了反假货币宣讲和反假知识入农户等宣传活动。





反假货币宣传工作效率提升及方法选择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毕节市中心支行

编者按：当前，反假货币宣传工作已经得到切实有效开展，城乡公众反假货币知识水平有了较大程度提升，但在宣传工作效率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提升和改进空间。现将有关思考报上，供参阅。

一、反假货币宣传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反假货币宣工作事关国家的信誉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表明党和政府保护广大人民利益、打击制贩假币犯罪的坚定决心和各级政府为广大农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反假货币宣传工作在人民银行、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的努力下，得到切实有效开展，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外出务工人员认识到假币的危害性，了解制贩、使用假币假币是违法行为，自觉与制贩假币犯罪行为作斗争，守法经营，勤劳致富。

但当前制贩假币犯罪活动仍十分猖獗，假币的流通，影响了人民币的信誉，破坏了金融秩序，损害了人民利益，阻碍了国家经济建

设，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当前反假货币宣传工作现状与趋势

(一) 集中宣传与常态化宣传相结合。经过多年持续的反假货币宣传工作开展，已经逐步形成了集中重点宣传与常规常态化反假宣传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在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的领导下，贵州省联席会议各组成单位也在积极贯彻落实相关反假宣传工作部署。以反假宣传主力军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来看，在平时坚持用电子显示屏、营业网点摆放宣传资料、公示《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等方式开展常规化反假宣传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地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的各类集中反假宣传工作，例如反假货币宣传月、金融知识宣传月等。

(二) 传统宣传方式为主逐步转向传统、新型宣传方式共同发展。随着当前科技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以传统的反假宣传为主的宣传方式也逐步转向传统、新型宣传方式共同发展。以前的反假宣传主要采用常见的发放宣传单、设置反假

咨询台、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随着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的大量普及，反假宣传形式也逐步转向充分利用传统、新型宣传方式共同开展，并已取得一定的效果。

(三) 被动宣传为主转向被动与主动宣传相结合。被动宣传主要是由各地反假货币工作联席办公室统一部署，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的形式进行开展，以前主要以被动宣传为主，成员单位开展反假宣传主动性较差。如今，各成员单位已逐步形成了被动与主动宣传相结合的宣传工作模式。例如，在积极集中开展好反假联席会议安排的反假宣传任务的同时，也注重加强了平时自主进行反假货币宣传的频率。

三、反假货币宣传工作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宣传方式单一，宣传效果欠佳。在反假宣传方式方面，宣传方式略显单一。传统的发放反假宣传单、设置反假咨询台、现场答疑等方式仍然占据较大宣传比重，公众对此类宣传方式已经司空见惯，吸引力较低。尽管结合了反假宣传进校园、进学校、进农村等方式，以及融合了其他媒体宣传方式，但仍显单一，宣传效果不太理想。

(二) 农村地广人稀，宣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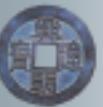
量薄弱。尽管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近年来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等成员单位反假宣传重心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倾斜，但受限于农村地广人稀，整体文化水平较低，金融机构网点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较少，宣传力量薄弱，反假宣传工作效率和宣传效果欠佳。在城市宣传力量较大，新媒体、新技术运用较好，整体受众文化水平较高的前提下，农村与城市反假宣传受众“知识沟”有呈进一步扩大趋势，从而影响农村反假货币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 机构间反假宣传协调存在一定困难。就目前而言，反假货币联席会议成员主要包括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宣传部、公安、工商、教育等部门。但在实际反假货币宣传工作开展过程中，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较为得力，但和同级的地方政府其他部门在协调上存在一定困难，这对反假货币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例如，在集中宣传期间，需要摆摊设点宣传时，往往受限于当地城市管理部门基于城市管理方面的限制。

四、反假货币宣传工作效率提升

(一)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抓好宣传工作。一是要切实加强宣传





工作的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妥善安排，把宣传任务落实到位，维护群众利益和人民币信誉不受侵害，争取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二是要精心组织，注重效果，认真开展反假货币集中宣传活动。特别要充分考虑到各地农村文化特点和农民接受能力，坚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反假货币知识送下乡”活动；继续深化“反假货币知识进校园活动”，扩大反假货币宣传影响层面，发挥教育辐射功能；突出面向百姓宣教结合，充分利用“反假货币成果展”等，营造整个社会参与反假货币宣传的氛围。三是要职责明确，措施到位，抓实宣传任务。明确宣传工作参与各方的责任，加强督促指导，保证各项宣传工作能够按照统一化、制度化和日常化的要求进行，并使日常化的宣传工作得以长期坚持开展下去，完成好各项宣传任务。

(二) 加强机构间沟通协调，形成反假货币宣传合力。一是建议由政府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出面协调公安机关、宣传部、工商、教育等部门，建立防范、打击假币犯罪组织体系，整合各部门的反假宣传资源，各负其责真正的行使反假货币宣传的社会责任。二是基层人民银行作为反假货币工作的牵头单位，要及时制定反假宣传方案和措施，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与当地政

府部门沟通协调，组织开展反假货币集中宣传活动。三是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为契机，加强对各职能部门反假宣传的考核，制定考核标准，包括宣传次数、参加人员、材料报送等内容，以强化反假货币宣传的推动力，实现整体联动。如2016年8月27日至28日，由黔东南中支牵头，组织黔湘桂三省（区）六县以“百姓大舞台”的形式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并到三省接边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假货币知识宣传活动。通过多种方式的宣讲使黔湘桂三省接边地区老百姓对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反假知识有了更新、更全面的了解，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 注重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将反假宣传工作重点向农村等薄弱地区倾斜。一是加强对基层人民银行反假宣传员、商业银行现金业务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出纳等人员的培训，提高反假宣传员的反假知识和业务技能。一是选派骨干力量，建立起农村地区强有力的反假宣传队伍，深入边远农村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志愿者服务宣传的作用，切实提高反假货币工作水平。三是以涉农机构、农村现金综合服务平台等农村金融服务站点为基础，建立初步的农村地区反假宣传网络，并根据实际情况，有效利用信贷员、乡镇村干部

等与农户有着特殊联系的特点，对其进行专门的、全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打造出一批具备识假、防假、打假技能的骨干力量，有力促进农村地区人民币反假工作的开展，巩固农村人民币反假成果。

五、反假货币宣传工作方法选择

(一) 因地制宜。现行宣传方式是全国实行统一集中的宣传月、宣传周活动，不完全适应边远山区农村，宣传效果达不到预期目标。因此，反假货币宣传工作的开展，既要与全国宣传时间保持一致性，又要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做到一致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如在时机选择上，结合农时特点，根据农忙和农闲的季节做出相应的调整。即农忙时宣传地点放在城镇地区，农闲时则对乡镇加大宣传力度，避免在宣传活动的时间选择上搞“一刀切”，这样可节约宣传成本，提高宣传效率。2016年9月7日在雷山西江苗寨组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反假货币双语宣传”活动，人总行反假货币联席会议办公室领导亲临现场，对黔东南州中支积极创新反假货币宣传模式，从单语到双语再到三语多形式、常态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和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二) 因人制宜。在反假宣传

方法选择上，要突出针对性，针对不同的群体而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宣传方法，以提高宣传效率。一是以学生为切入点，培养反假货币新生力量。充分利用中小学生人数众多，覆盖面广，易于接受和传播的优势，向他们普及反假货币知识，培养学生从小爱护人民币，增强识别假币能力。二是针对文化水平较高的老人、孩子，可以采用漫画、幽默故事等增强趣味性的宣传折页。三是针对边远山区民风淳朴不懂汉语的村民，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少数民族语言，通过实物比对、图片展示等方式现场为民众讲解真、假人民币识别技巧。四是针对年轻人、上班族等群体，采用时尚的网络进行反假宣传，增吸引力。如开设反假宣传微信号、官方微博、电子显示屏等渠道，定期发布新的假币特征，宣传反假新方法等。

(三) 因需制宜。一是集中推广公信力高的优质反假宣传作品，进行重点突破。集中推广公信力高的优质反假宣传作品对提升反假货币宣传工作效率和效果意义重大。同时具备公信力高、优质两个条件的反假货币宣传作品在宣传工作中能真正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等发布的优秀新媒体宣传作品等，应当集中在全国范围内





特征进行了详细生动介绍，并对于群众比较关心的：“认定鉴别假币应该找谁”、“银行收缴假币时有异议如何解决”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本次直播取得了较好效果，直播期间点击浏览量总计300万人次。在2017年10月17日腾讯新闻发布的直播榜中，该贵阳中支“人民币直播视频”位于“最独家”栏目榜首，视频宣传的点击量已超过6000余万人次，首创运用网络直播新媒介进行金融知识宣传，不仅促进广大社会群众认识人民银行相关部门工作职责，更有利于群众了解人民币相关知识，增强群众反假货币意识，切实提高金融知识素养。

与“社交平台”联姻，反假货币深入人心

2017年贵州省反假联席会议办公室率先使用反假动画宣传，以集市商品交易、“假币掉包”、购物找零等常见假币惯用手法及人民币动态防伪知识为背景，以动画形式将假币犯罪分子形象深入老人、儿童心中，使群众达到“现象一看就懂，技能一学就会”的效果，加深印象，牢记于心，在全省各地及各媒体平台进行重复播放。并利用微信、QQ等社交平台传播快、受众广的特点发布动画，群众纷纷点击观看学习并转发链接，多次被各大视频网站转播。同时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反假小超人”有奖在线答

在各类媒体、各单位进行重点强力推广。这类作品往往具有较强的公信力且质量较高，对提升反假宣传工作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一定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反假宣传效果。二是结合金融精准扶贫，寻求对边远山区的财力支持，通过政府主导，为对口帮扶村配备假币鉴别仪器，免费提供假币鉴别服务，提高农村地区假币的鉴别水平。三是把春节前后一个月作为重点宣传时段，开展集中宣传。此段时间外出务工人员都陆续返乡，各处散居的农户都到城镇采办年货，人口流量相对要大得多，在这段时间选择中心城镇开展反假知识进闹市、进车站等集中宣传，可以大大提高反假货币宣传的受众面和宣传效果。

创新宣传方式 推行“互联网+反假货币宣传”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

近年来，随着贵州省经济快速发展，我省科技产业也在不断创新，人们把移动通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带到了各行各业，带到了千家万户，使我省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处在了“互联网+”的背景下。在这样大背景下，反假货币宣传如何搭上“互联网+”的顺风车，成为一线反假货币工作青年思索的课题。互联网从诞生到发展壮大，深刻改变了原有的新闻信息传播方式、重塑了新的媒介生态和传播格局。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大众，人人都是“受播者”，又人人都是“传播者”，并且互联网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双重特点，所以将“互联网+”与反假货币宣传进行结合，利用“互联网+反假货币宣传”的模式，

突破传统宣传方式的瓶颈，发挥互联网自媒体平台优势，扩大宣传受众面，降低宣传成本，提升宣传效率，以最直观的方式，形象的内容向百姓传播识假防假打假的金融知识，保护群众合法利益。

自2014年始，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了，反假货币工作重心前移总要求，反假宣传工作坚持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公众的原则，采用日常性与集中性宣传、线上与线下宣传结合的方式强化宣传实效，巩固重点区域及广大农村地区宣传成果。我省反假货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特别是公安机关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统一部署下，于每年9月份在省内各教育、交通领域、农村偏远地区、集贸市场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广泛地开

展“反假货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专题宣传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公众识假辩假的能力。

首次尝试“网络直播”，反假宣传成效显著

2017年，为向社会普及人民币知识、提高公众对人民币防伪知识的认知度，贵阳中支货币金银处积极运用新型网络媒介力量创新宣传方式，让老百姓近距离的认识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了解人民币的相关知识，9月18日上午，特邀请《贵州日报·今贵州》记者来我处进行人民币相关知识现场访谈，并在“腾讯视频”、“腾讯新闻”、“天天快报”等四家网络平台同步直播采访情况。

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向来访记者介绍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的职能，并围绕人民币流通历史、发行过程、更新换代和纪念币的发行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当记者聊到了“假币”这一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话题，记者与相关工作人员采取了一问一答的形式对群众感兴趣话题进行现场问答，着重介绍了人行货币金银部门的反假职责，采取通俗易懂的言语向记者和在线群众介绍了人民币的基本特征、假币的种类、人民币的防伪标识。最后，反假工作人员通过专业仪器现场演示了如何鉴别假币，采取真假对比、机具检测、手工鉴别的方式对人民币的专业防伪





题活动。由人行牵头各金融机构积极利用传统媒体及互联网平台向群众推送“反假小超人”有奖答题活动，通过车站、广场电子屏幕、公交车载等电子媒介播放反假视频，通过报纸等主流媒体定时播报和刊登宣传，同时充分利用各自官微、官网及美篇、易企秀等互联网媒介更直观形象、更生动展示宣传，引导群众参与答题活动。通过公众号推送引导，使反假信息迅速在朋友圈火热转发起来，极大地扩大宣传范围、节约宣传成本、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强化宣传的效果。

此次反假宣传与“互联网”结合，实现一次质的提升。从宣传方式看，今年的反假宣传工作充分落实降成本重效率的工作要求，有效解决各单位经费紧张与宣传广度之间的矛盾。历年来反假货币宣传品印刷量基本保持在300至400万份左右，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时在街头巷尾设点咨询宣传，宣传品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今年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布制作的电子宣传品，不仅传播速度快、阅读面广，而且节省开支，同时对社区、学校等公共环境无任何影响，实现了节约成本、环保高效的工作目标。

从宣传效果看，往年宣传都是以“金融机构网点”为宣传阵地，通过设置咨询台、咨询点，通过向

群众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及识假防假技能，散发宣传折页等的简单方式进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然群众的参与性、接受度普遍偏低。今年首次利用互联网直播与动画视频等方式向群众呈现宣传内容，群众主动性、参与度明显提高，尤其是老人和广大中青年随时可以打开手机在线观看，在几天时间内就有近千万群众在线观看，并通过转发分享，引发学习热潮。

从宣传组织情况看，今年的宣传工作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电视媒体及其他单位的积极配合，使反假工作从金融机构与公安部门的“孤军奋战”向多方协作，合力打击的“大队伍”转变，对制贩假币活动打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组合拳。尤其是黔东南州中支积极与邻省人行沟通，建立“省际结合，区域联动”集中连片开展反假货币多语宣传，要求辖内金融机构跨区结成宣传小队，形成既有“大部队”的宣传，又有“小分队”的重点突破，到群众中面对面的传授，手把手讲解，在少数民族集聚居地形成气氛好、方法多、形式新、效果好的宣传氛围。面对近年来我省制贩假币的抬头趋势，各部门紧密配合，对制贩假币活动打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组合拳，有效防止假币流入市场，减少假币危害，为重点区域和农村地区筑起一道坚实的打击假币屏障。